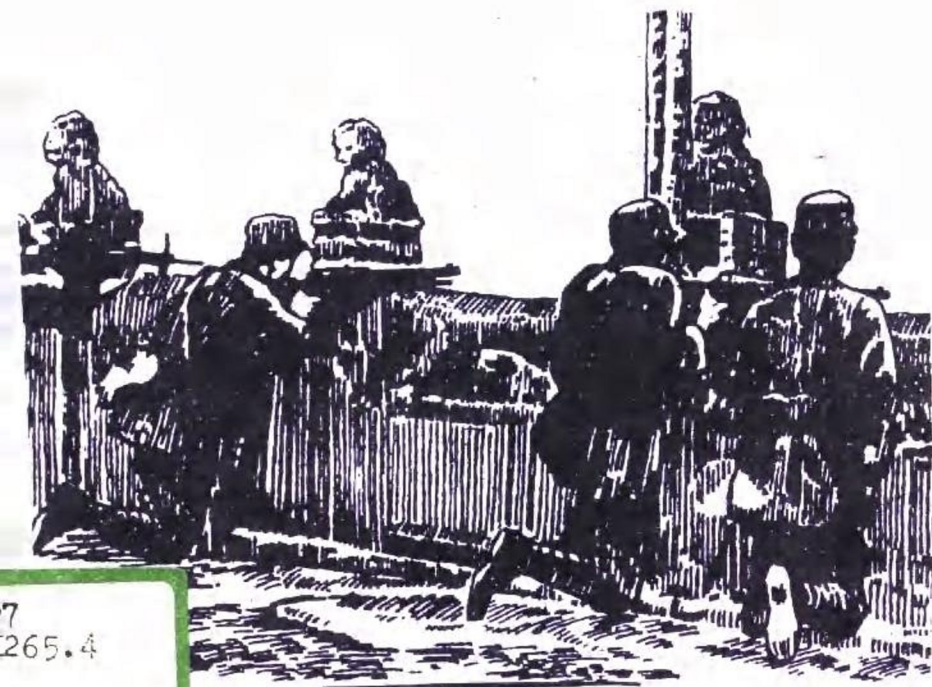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七七事变



7
265.4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97
K265.4
1
2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七七事变

野庆裕 编著



目 录

一、事变前的双方态势	(1)
二、策动“华北自治”	(9)
三、芦沟桥畔的枪声	(16)
四、“不扩大”的幌子	(27)
五、平津失陷	(39)
六、全面抗战的开始	(43)

芦沟桥位于北京城西南约二十余公里的宛平城西门外，横跨永定河东西两岸。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军国主义就在这里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芦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开始了它们蓄谋已久的灭亡中国的全面战争。

一、事变前的双方态势

日本侵略军继 1931 年“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三省之后，在其灭亡中国基本国策的驱使下，立即以东北为基地，向中国内地扩张，迅速将战火从关外烧到关内，把侵略魔爪从东北伸到华北。日军先是占据山海关，接着又侵占我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当时称热河省，1956 年撤销），在占领了承德之后，又向长城一线发起进攻。至 5 月 13 日，日军进逼长城的冷口、古北口、喜峰口等地，兵锋直指平津。在此华北危急关头，5 月 31 日，国民党亲日派官员熊斌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签订了卖国的《塘沽协定》。按照这一协定，中国军队撤退至延庆、昌平、顺义、香河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划上述连线至长城为非军事区，非军事区内由日军驻屯军管辖。由此可见，这里所谓的“非军事区”，仅仅是为了解除中国人的武装而说的，只不过是为了日本侵略军顺利占领而找的一个好听的名词而已。

《塘沽协定》的签订，就等于在事实上承认了日本侵占中

国东北、热河的既成事实,并放弃了长城防线,将察北、冀北大片国土拱手让给日军,使其随时可以进占冀察,直取平津,从而形成了对北平(今北京)、天津的战略包围态势,为日军向华北扩张敞开了大门。对日本来说,《塘沽协定》“合法”地把热河并入了伪满洲领土,这不仅巩固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统治,而且也打开了其通向华北的最后一道屏障。自此以后,日本即利用《塘沽协定》,以重兵压迫关内,威胁平津,为它的下一步侵略行动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日本方面:日本是个只有 37 万平方公里的岛国,资源很少,当时人口只有约 7000 万,连同受其控制与奴役的朝鲜与台湾在内,人口也不足 1 亿。但是,日本的科技水平与生产能力都较高,1936 年的钢产量即达 640 万吨,能制造航空母舰、战列舰、飞机、大炮和坦克等。年生产能力:飞机 600 架,坦克 200 辆,在作战中基本可以保障需要。日本有常备军 38 万余人,陆军 17 个师团、海军舰艇约 190 万吨,空军 54 个中队,飞机 2700 余架,其中属于陆军 1480 余架,属于海军 1220 余架。当时日军用于侵华作战的师团编制为:每个师团约 22000 人,马 5800 匹,步骑枪 9500 支,轻重机枪 600 余挺,火炮 108 门,坦克 24 辆。芦沟桥事变前,日军主力驻在本土、朝鲜和中国东北各地,处于临战状态,可以通过受其控制的北宁铁路(北平至沈阳)迅速运抵中国华北。

为了做好全面侵华战争的军事准备,1936 年 4 月 17 日,

广田内阁决定加强日本在中国的驻屯军,18日发布陆甲第6号军令,对中国驻屯军进行改编,规格与关东军相同,司令官由陆军中将或大将担任,新编制如下:

中国驻屯军司令部

中国驻屯旅团司令部

中国驻屯步兵第1联队

中国驻屯步兵第2联队

中国驻屯炮兵联队

中国驻屯骑兵队

中国驻屯战车队

中国驻屯工兵队

中国驻屯宪兵队

中国驻屯通信队

中国驻屯军医院

中国驻屯军仓库

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为田代皖一郎大将。司令部、中国驻屯步兵第2联队、军直辖各部队驻扎天津;中国驻屯旅团司令部(旅团长何边正三少将)、中国驻屯步兵第1联队驻扎北平;其他部队分驻于各驻屯点。随着中国驻屯军的升格,5月6日,日本内阁又发布了临参命第51号,规定中国驻屯军的任务是维护日本在华北的利益,必要时使用武力;关东军将一部分兵力配置在长城线南侧,随时准备出兵华北。6月3日,又制定

了1937年度对华《用兵纲要》，准备以8个师团在华北五省作战；以5个师团在沪宁方面作战；以1个师团在广州方面作战。

根据调整后的中国驻屯军新编制，1936年5月，日本便急剧增加在华北的军事力量。从5月9日至6月上旬，日军利用换防的机会，将中国驻屯军由2000人增加到6000余人。日本这次增兵华北，既是其准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重要步骤，又是对中国主权新的侵犯。

外国在华北驻兵始于1901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辛丑条约》。日本参加八国联军侵华作战后，取得在中国北京、天津和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要地的驻兵权，1901年11月24日，日本派出“清国驻屯军”，由军司令部、北清驻屯各部队、上海驻屯步兵大队编成。1913年10月改称“中国驻屯军”。日本“华北驻屯军”长期侵占上述各地。至1935年5月，其已有北平驻屯步兵2个中队，天津驻屯步兵8个中队、山炮兵1个中队和工兵1个中队。这些日本兵分布在北宁铁路沿线及以东至塘沽军港（上海驻屯军略）。

当时，《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国家应允，由各国分应主办，会同酌定数处，留兵驻守，以保京师至海道无断绝之虞。”条约说得很清楚，各国驻兵范围是从北平到海口，即从北平至山海关的北宁铁路沿线，驻兵的目的也是确保北平至海口的交通畅通。而今日本人增兵华北，既未取得中国政府同意，又

未与各国协商。而且增兵的目的,据当时日本参谋本部总长闲院宫载仁元帅解释说,一是为了“防共”,二是为了“保护侨民”。这与《辛丑条约》中关于各国驻兵的规定显然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实际上,日本人的所谓“防共”和“保护侨民”,都不过是为了掩盖其全面侵华战争准备而找的一个借口而已。

侵略中国,是日本军国主义长期以来的基本国策。早在1927年6月至7月,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上,讨论并决定对华方针时,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于7月25日在给天皇的奏折中便提出:“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多年来,日本统治集团,一直在为侵略中国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各种战争准备。1936年“2·26”事件后组成的广田法西斯内阁,其灭亡中国的步伐愈发加快。1936年8月7日召开的首、外、陆、海和藏五相会议所确定的“国策基准”,主旨就是加紧扩军备战,尽快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根据“国策基准”,1936年11月26日,日本陆军本部制定了《军备充实计划大纲》,计划以1937年为第1年度,到1943年将已有陆军17个师团扩充为41个师团,空军54个中队扩充为142个中队;海军要建造包括巨型战列舰“武藏号”“大和号”在内的、总吨位达27万吨的66艘战舰。为了实现这一宏大的扩军目标,对资源贫乏的日本来说,首先就要解决战争经济的资源供给。为此,日本法西斯分子便把攫取资源的贪婪目光盯住了中国,特别是中国的华北。1937年1月广田内阁辞职,

林銑十郎出来组阁,5月林銑内阁辞职,近卫继任。在近卫内阁中,入阁大臣有外相广田弘毅、陆相杉山元大将、海相米内政光大将、藏相贺屋兴宜。内阁的核心人物——首、外、陆、海、藏五相,都是清一色的法西斯分子。1936年以来,日本政局的这种动荡,正是反映了日本法西斯灭亡中国的要求已是急不可待。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车轮,终于由近卫内阁启动了。

中国方面:中国领土广大,超过日本数十倍,资源丰富,战前人口约4.5亿,超过日本6倍多。国民党在十年内战中建立起一个庞大的陆军系统,当时国民党政府有陆军步骑兵191个师、52个旅,海军船艇5.9万余吨,空军飞机300余架,总兵力约200万人。中国经济落后,战前年产钢不足千吨,军火工生产能力也是微乎其微,只能生产少量步兵武器和小口径火炮,难以满足战争需要。大型武器装备如飞机、大炮、坦克等都不能制造,完全依靠向国外购买,战争过程中难以得到及时补充。

1933年起,在德国军事顾问团的指挥下,国民党着手国防整备五年计划,首先对陆军进行编制和装备方面的整顿,从而使中央嫡系部队的现代化程度大大加强。其主力和精锐步兵师的编制:师司令部、2个步兵旅、1个骑兵旅、一个炮兵团、一个工兵营、一个辎重营及特务连、卫生连、通讯队等,人员约13000人、马3500匹、步枪6200支,轻重机枪320挺、迫击炮

24 门、步兵炮 24 门、野炮 36 门。步兵师的这种装备是当时的世界水平。国民党军拥有 50 个这样的师，计 69 万余人。而中央旁系特别是地方军阀部队则大大逊色。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面临着三大矛盾：一是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二是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矛盾；三是内部不同派别、特别是同地方军阀的矛盾。在这三大矛盾中，国民党政府理应把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放在首位，停止内战，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御外侮。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到 1936 年西安事变前，一直推行“攘外必先安内”，实际上是“只安内，不攘外”，对外屈辱妥协，对内无情镇压的反动政策。特别是在外寇入侵、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国民党政府还设想利用日军的进攻来削弱其他派别的力量。因此，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下，国民党政府一再屈膝退让，给日本法西斯向华北的扩张大开方便之门，不但把东北三省拱手让给日本，而且随之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还将日本侵略势力引进了冀东、察东和绥东，造成了华北局势的严重危机。

面对日寇嚣张的侵华气焰，国民党政府虽然进行了一些抗日的军事准备，但其准备的重点是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和美英势力的中心——上海、南京和武汉方面，而在北平、天津及河北地区，却没有任何军事设施。因此，战争前线的国防大门基本上是敞开的。

“七七事变”前，位于国防第一线的部队，是国民党第29军，军长宋哲元，副军长秦德纯、佟麟阁，参谋长张樾亭，非国民党中央嫡系。第29军下辖4个步兵师（每师4个旅），1个骑兵师，3个步、骑独立旅及1个保安队，共约10万余人。军部在北平。该军分驻于北平、天津、张家口、保定、平绥和北宁铁路沿线广大地区。具体兵力部署：第37师（师长冯治安）辖第109、第110、第111、独立第25旅，约15000人，驻西苑；骑兵第9师（师长郑大章）约3000人，特务旅（旅长孙玉田），约4000人，同驻南苑；独立第39旅（旅长阮玄武），约3000人，驻北苑；冀北保安队（司令石友三），约2000人，驻黄寺。以上各部与日本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1联队对峙于北平近郊；第38师（师长张自忠），辖第112、第113、第114、独立第26旅，约15000人，驻天津及北宁路北平至天津段沿线，与日本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2联队对峙于天津地区；第132师（师长赵登禹），辖第1、第2、独立第27旅，约15000人，作为二线部队驻河间县；第143师（师长刘汝明），辖第1、第2、独立旅20、29旅，约16000人，以及独立第40旅（旅长由刘汝明兼），约3400人，驻张家口地区；独立骑兵第13旅（旅长姚景川），约1500人，驻宣化。以上各部于日本关东军对峙于张北、沽源一线。

国民党的上述兵力部署，暴露出一个严重问题，这就是作为战争前线，在日寇虎视眈眈下处于最危急境地的平津地区，

恰恰是国民党军事力量最薄弱的地区。尽管国民党拥有庞大的军队,但前线却只有第 29 军,而且黄河以北的冀鲁地区没有配置任何预备兵力。在强寇临境的危急时刻,华北地区却是令人难以置信地门户大开。因此,“七七事变”发生后的严重局面也就无可避免了。

二、策动“华北自治”

华北地区当时包括 5 省(冀、鲁、晋、绥、察)2 市(北平、天津),面积一百余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的 1/11;人口 7 620 余万人,超过日本全国人口(当时约 7 000 万)。华北地区物产丰富。从“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侵略者在武装占领中国东北的同时,就加紧了在华北地区的各种侵略活动。

1935 年 11 月 12 日,关东军独立混成第 1 旅团陈兵山海关。接着在日本武力保护和特务机关的策划下,制造了“冀东事件”,将通县以东 22 县划归己有,在侵占我东三省及热河之后,又掠走了平绥铁路北平至张家口段、北宁铁路北平至山海关段之以东以北广大地区。北平、天津实际上已完全陷入日本人的包围之中。这样,到 1935 年底,日军侵略军已完全掌握了进出华北的陆(北宁铁路)、海(塘沽军港)交通,并可以此作为进攻河北、山东的跳板。迄 1937 年初,日本侵略军全面进攻华北的军事态势已经形成,兵力部署亦已就绪,其关东军作为二线部队,占领长城各口——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

线以南地区,作为战略机动部队;日本中国驻屯军作为一线兵力,屯兵平津,跃跃欲试。这两支侵略军构成了互相策应的犄角之势。日本帝国主义在取得了对华北的上述有利态势之后,便迫不及待地向华北伸出了魔掌。

1933年2月13日,关东军在进行热河作战时,就把驻沈阳的日本特务机关长板垣征四郎火速派到华北,建立天津特务机关,借关东军在热河对华北的压力,进行分裂华北的活动。5月21日,板垣在给陆军本部的电报中明确提出:“就巩固与确立满洲国而言,在华北建立亲日满政权最为必要。”1934年,日本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召集日本驻华各地武官,多次进行密谈,曾设想联合华北和西南各地军阀,南北夹击国民党政府,造成中国的分裂局面,以分而治之。1935年1月初,关东军在大连召开日本驻华各地武官会议,进一步商讨侵略华北的计划,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对华北进行新的侵略的动员令。会议之后,日本侵略华北的活动即全面展开。

为了减少在夺占华北时军事上的压力,日本人还以各种莫须有的借口,逼迫中国减少在华北地区的军事力量。1935年5月29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借口东北义勇军进入了河北省以东非武装区地带和天津两个汉奸报社社长被暗杀,向北平军事分会委员长何应钦提出口头通告:罢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于学忠的第51军及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撤出河北省;把平津地区划入非武装区地带;取消一切排日机关等

要求。第二天，天津的日本中国驻屯军一个中队竟然乘坐装甲车，在河北省政府前举行武装示威。此外，为了迫使国民党政府接受所提的条件，6月7日，关东军还调兵遣将，将军队集结于山海关、古北口、锦州、唐山一带，向中国方面施加压力。酒井隆甚至还限定中国方面必须在6月12日前答复，否则日军将采取“断然之处置”。蒋介石政府在日本的压力下完全屈服。6月10日18时，何应钦通过日本驻北平助理武官高桥，向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答复说：“根据中央训令，全部接受日方要求：（一）关于河北省（国民党）党部的撤退，十日发出命令，自即日开始；（二）第51军调防自11日开始，利用铁路运输，预定于6月25日调防完毕；（三）决定将中央军第25师及第2师从河北省撤出；（四）国民党政府通令全国，禁止排外排日。”这就是臭名昭著的“何（应钦）—梅（津美治郎）协定”。《何梅协定》是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政策的产物，是继《塘沽协定》之后的又一丧权辱国协定。

在此前后，关东军也加紧向察哈尔（河北省西北部和内蒙古一部分）渗透。1935年6月5日，关东军特务机关的4名特务，在从多伦到张家口的途中，因拒绝接受中国军队的检查，在张北被宋哲元第29军第132师逮捕，经过审讯，于次日上午释放。11日下午，张家口的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即借口日本特务在审讯中受到恐吓，向第29军副军长秦德纯提出：（一）惩办直接负责人；（二）第29军军长亲自向日本人道

歉；(三)保证今后不再发生同类事件,限5天内答复。还没有等到答复,日本人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张北事件发生后,日本人即想利用宋哲元与蒋介石的矛盾,希望以宋哲元的29军代替于学忠的51军,以此来达到控制华北的目的。6月23日,日本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在北平向秦德纯提出了关东军制订的《对宋哲元交涉要领》,要求:(一)宋军撤至长城西南;(二)解散一切排日机构;(三)宋哲元向日方道歉,处罚张北事件负责人。25日,土肥原又威胁说,如果中国方面3天内不答复,他就回长春了。这就意味着要采取军事行动。6月27日,秦德纯根据国民党政府的指令,终于接受了土肥原提出的全部要求,双方签订了“秦(德纯)——土(肥原贤二)协定。”《秦土协定》与《何梅协定》如出一辙,它同样是日本蓄谋吞并华北的产物,是一个丧权辱国的协定。不久,于学忠的51军外调,宋哲元的29军根据协定移驻平津地区。

《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的签订,使华北地区的军事力量大大削弱。因而,日本人的下一步行动,就是如何利用这一有利形势,达到吞并华北的目标。

日本对华北的扩张,先是采取以军事为后盾的蚕食手段,扶植亲日傀儡政权,实现所谓的“华北自治”,妄图把华北从中国版图上分裂出去,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不战而获。

1935年9月24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多田俊发表声明,公开宣称要把“国民党和蒋政权从华北排除出去,……把

反满抗日分子彻底地驱逐出华北”，实现“华北经济圈的独立，……使华北财政脱离南京政府的管辖”和“华北五省的军事合作”以及“组织华北五省联合自治政府”等等。多田声明第一次公开提出了日本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全面实现华北“自治”的要求，这表明日本已是迫不及待地要控制整个华北。当时，中国的舆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多田声明说明“日人在最近必完成其囊括华北，侵略西北之野心。”和“多田声明”相配合，10月4日，日本又进一步提出了当时臭名昭著的“广田三原则”：（一）使中国方面彻底取缔排日的言论和行动，摆脱依靠欧美政策，采取对日亲善政策；（二）不但要使中国事实上默认满洲国，而且至少使华北地区在经济上、文化上与满洲国进行合作与交往；（三）使中国协力排除赤化势力。由此可见，“广田三原则”不仅要求华北建立亲日政权，而且还妄想把南京国民党政府也变成亲日政权，以便控制整个中国。

10月中旬，关东军将土肥原派到天津，加紧实施华北“自治”的活动。土肥原一到华北，就四处活动。开始土肥原曾计划联合平津的宋哲元、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在华北五省建立“自治”政府，后来又提出以平津地区的宋哲元为中心，先实现河北、察哈尔两省“自治”然后再联合阎锡山等人，实现华北五省“自治”。为配合土肥原计划的实施，11月12日，关东军命令第一混成旅团进至山海关、古北口一线待命，16日，又令空军的两个中队随时准备向华北发起攻击，海军

也在青岛集结,企图以军事压力迫使宋哲元就范。18日,土肥原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威胁说,如果宋哲元不在11月20日前宣布“自治”,日本将单方面自行宣布。这时,日本政府考虑到土肥原急于求成的作法,有可能会适得其反,担心在国际上引起重大反响,而且自己准备还不完全成熟,因而没有同意土肥原限期宣布华北“自治”。土肥原只好于11月24日,在通州成立了以大汉奸殷汝耕为首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2月25日,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这是日本在华北扶持的第一个傀儡政权,为日后在华北扩大侵略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后,日本并没有放弃其实现华北“自治”的计划,继续向宋哲元施加压力。11月29日,宋电告南京政府,认为“挽救华北只能实行自治,别无出路”。这表明宋哲元此时已感到难以承受日本人的压力。11月30日,蒋介石与其军政要员商讨后,派何应钦等人到北平与日本人商讨解决华北问题。何到北平后,经与各方面的协商,在得到日本的允诺后,决定成立“冀东政务委员会”。12月18日,“冀东政务委员会”正式成立,由宋哲元担任委员长,秦德纯等17人为委员,负责管辖平津地区和河北、察哈尔两省。同日,宋哲元发表施政纲领,宣布:(一)进行地方改革;(二)整顿财政;(三)“冀东政务委员会与日本有特殊关系,为两国利益计,应互维互助,实行真正亲善。”由此可见,“冀东政务委员会”是一个既同国民党政府有联系,又同日本有联系的半自治政权,可以